

# 基于营商环境视角的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与对策

任力<sup>1</sup>, 江熙瑶<sup>2</sup>

(1. 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2. 中国人民大学 教育学院, 北京 100872)

**摘 要:** 为了研究文化产业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及营商环境在其中的影响, 利用中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2001—2020 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通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替换控制变量、改变时间区间、缩尾处理等方法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使用 Hausman 检验排除了内生性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还借助异质性分析探讨了文化产业影响经济增长和营商环境在其中的机制作用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 文化产业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 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每增加 1%, 地区的人均 GDP 增加 0.066%; 营商环境会影响文化产业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过程, 当前中国的文化产业和营商环境尚未形成良好配合; 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较为明显。研究表明, 要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 提高文化转化为文化资本的效率, 优化文化产业的营商环境, 促进文化产业和营商环境的协调发展, 激发文化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积极性, 因地制宜合理配置文化资源。

**关键词:** 文化产业; 营商环境; 产业聚集; 市场监管; 文化企业; 投融资条件

**中图分类号:** F49; F06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25)02-0105-20

## Impact mechanism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on economic growth and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REN Li<sup>1</sup>, JIANG Xiyao<sup>2</sup>

(1. School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China;

2. School of Edu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rol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i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impact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this process, this study 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panel data from 31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01 to 2020. A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is constructed, and the robustness of the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is tested through methods such as replacing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s, substituting control variables, changing the time interval, and applying winsorization. The Hausman test is used to rule out endogeneity bias in the regression results. Additionally,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s employed to examin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mechanism by which the cultural industry influence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role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significantly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for every 1% increase in per capita expenditure on education, culture, and entertainment, regional per capita GDP increases by 0.066%.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ffects the process by which the cultural industry contributes to economic growth, yet a well-aligned synergy between the cultural industry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has not yet been formed in China.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on economic growth is more pronounced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increase investment in the cultural industry,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transforming culture into cultural capital, improv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for cultural industries, promote thei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stimulate the initiative of market entities such as cultural enterprises through rational alloca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

**Key words:** cultural industry; business environment;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market regulation; cultural enterpris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condition

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框架中,经济增长主要受到技术进步、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影

响。20 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形成了新的冲击,赋予了主流经

济学新的内涵,这一理论强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化作为构成并影响制度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中国正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现代化,这意味着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要重视人民精神世界的构建,充分发挥精神文明对于物质文明的促进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提到,要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文化产业正是其中十分重要且具有可持续性的动力。同时,营商环境在文化产业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强调,“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强调,“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这充分体现了优化营商环境是党中央根据新形势新发展新要求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从营商环境的视角出发,考察文化产业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能够深入探究文化产业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还能够加深认识二者之间营商环境这一桥梁的机制作用,从而提出更加合理的政策建议。

## 一、文献综述

### (一)文化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人类文明发展从古延续至今,文化的巨

大力量不可忽视,文化本身及其现代化转型催生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因素的研究。一些经济学者很早就注意到文化因素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但他们仅仅将文化因素作为人类活动的背景或约束条件,并未直接将文化因素与经济相关联。后来,新制度经济学学者 GREIF 认为,文化是一种非正式制度,一国的历史文化能够影响该国的制度设计,进而影响经济发展<sup>[1]</sup>;同时, GRAHAM et al.、SACCO et al. 认为,文化能够通过加强地区及当地企业对高质量投资和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技术创新等途径,带动地区的经济增长<sup>[2-3]</sup>。

关于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早期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质性研究,较少涉及实证分析。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文化的概念过于抽象,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可量化的指标,并将其纳入经济增长的研究框架,从而将文化因素和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区分开来。针对这一问题,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BOURDIEU 率先将文化因素作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与物质资本、劳动力等类似的独立生产要素,并将其资本化<sup>[4]</sup>;随后,RICHARDSON 首次将“文化资本”这一概念运用于学术研究<sup>[5]</sup>;THROSBY 将 BOURDIEU 的认识进一步完善和提炼,详细阐述了文化资本在经济学领域的概念,认为文化资本是蕴含在资产中的文化价值存量,它能够创造出文化价值,而这种文化价值能够随其依附的资产存量的增加,而提升某些商品或服务价值<sup>[6]</sup>,这也与马克思定义的资本是创造剩余价值的价值思想相吻合。高波等对文

化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渠道进行了探讨,认为文化资本是生产中报酬递增的重要来源,并能够制约人们对于其他要素的选择<sup>[7]</sup>。

上述对于文化资本的研究也催生了文化资本论。随后的经济学研究中,李怀亮等指出,文化资本论主要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探讨文化资本与个人发展之间的关系<sup>[8]</sup>,例如,PEREIRA 的研究证明了市场文化资本对劳动力参与度的积极作用<sup>[9]</sup>;二是研究文化产品和文化产业<sup>[8]</sup>,在文化产业产品中发掘文化因素的产品及产业赋能,并以此为基础,研究文化产业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例如,SCOTT 的研究显示,文化产业能够生产出具有高水平美学或符号学内容的商品和服务,由此带动经济活动的发展<sup>[10]</sup>。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文化资本论的第二个方向进行。

PRATT 认为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是现代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环节<sup>[11]</sup>,这意味着文化产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LAWRENCE et al. 在此基础上对于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式进行研究,认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渠道之一是将新兴文化产业产品与传统工业制成品相结合,这样使得新兴文化产业产品更易被公众所接受,同时能够赋予传统工业产品文化内核,进而产生独特的竞争优势<sup>[12]</sup>;王超越等认为文化产业应利用新兴数字化技术的协同创新优势,不断激发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活力,形成高质量的经济增长路径<sup>[13]</sup>。徐鹏程指出,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必须加快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完善资本市场,优化文化产业融资环

境,使文化产业与金融市场相辅相成、融合发展<sup>[14]</sup>;考虑到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YIN et al. 的研究表明,从事文化产业产品这类高象征性产品生产组织需要建立完善的管理系统,跟踪相关的产业动态,才能够建立持久的竞争优势<sup>[15]</sup>。

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将文化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研究框架,利用真实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姜琪采用不同方法估计中国各区域文化资本存量,验证了文化资本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sup>[16]</sup>。为了更好地研究文化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机制,SACCO et al. 构建了市场文化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分析<sup>[3]</sup>。在前人研究文化资本的基础上,潘越等进一步研究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认为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地方政府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有助于激发文化产业活力,从而更好地发挥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sup>[17]</sup>。进一步地,BUCCI et al. 将文化和人力资本投入纳入内生增长模型,详细分析了文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认为文化能够通过文化产业的形式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sup>[18]</sup>;SACCO et al. 又提出了新的概念和框架来研究文化产业,认为文化参与创造社会和经济价值,文化政策将在未来的政策设计中占据中心地位<sup>[19]</sup>。

张元阳使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全体居民每人全年平均文化娱乐用品和服务支出来作为文化资本的衡量指标,利用中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2—2017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文化资本对于经济增

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这一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投资和消费两方面产生<sup>[20]</sup>;而管振等的研究表明,教育能够通过劳动生产率这一渠道来影响经济增长<sup>[21]</sup>,张同功等的研究发现,公共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有利于经济形成良性循环<sup>[22]</sup>,因此本文的实证部分将教育纳入文化产业发展的衡量体系,通过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全体居民每人全年平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来衡量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程度。

## (二) 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现有文献普遍认为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助于经济增长。董志强等利用中国城市数据,将各城市开埠通商历史作为工具变量,发现了营商软环境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印证了“制度至关重要”的假说<sup>[23]</sup>;MES-SAOU D et al. 利用 162 个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衡量营商环境的相关指标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稳健关系<sup>[24]</sup>;GŁODOWSKA et al. 采用文献分析和定量方法,发现了经济增长对营商环境的依赖性<sup>[25]</sup>;吴韶华等发现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通过降低商务成本、改善社会服务水平等措施能够优化营商环境,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sup>[26]</sup>。

关于营商环境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许多文献肯定了创新和人力资本效应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营商环境通过创新对经济增长发挥的作用与 SCHUMPETER 提出的“创造性破坏”思想相关<sup>[27]</sup>。随后,AGHION et al. 将这一思想进行拓展,认为源于竞争性厂商的垂直产品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由创

造性破坏驱动的垂直产品创新进而一国的研究量和技能劳动禀赋决定了一国的经济增长率<sup>[28]</sup>;夏后学等指出,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降低当地企业经营成本,鼓励增加研发投入,促进市场创新<sup>[29]</sup>;许志端等的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能够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从而改善企业绩效<sup>[30]</sup>。而在人力资本效应方面,杜运周等的研究表明,优化营商环境能够通过发挥市场机制和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建立统一大市场,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sup>[31]</sup>;牛志伟等指出营商环境优化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营商环境的改善将帮助企业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sup>[32]</sup>。

近年来关于营商环境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进一步拓展。有学者采用不同方法专门测度中国各地区的营商环境发展程度,张三保等构建了中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发现中国省份营商环境具有层次化特征<sup>[33]</sup>;张爱华等利用熵权法测算了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水平综合指数,研究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水平的纵向趋势和横向差异<sup>[34]</sup>。也有部分文献探讨了营商环境作为其他因素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机制效应作用,NCUBE et al. 的研究发现,更强的经济增长与创业环境的改善相关联,而创业环境的改善又是营商环境优化过程中十分重要的环节<sup>[35]</sup>;张蕊等研究发现营商环境是数字金融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一个重要机制,并且这种机制存在地区异质性<sup>[36]</sup>;何地等认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改善营商环境,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sup>[37]</sup>。

### (三) 文化产业发展与营商环境的关系

营商环境影响文化产业发展主要有以下几条路径:

第一,投融资条件影响文化产业发展。营商环境是影响投融资条件的基础性因素,投融资条件是构成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约束力量。余晓泓指出,美国融资机制、融资方式和融资渠道为其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使其文化产业发展居于世界一流水平<sup>[38]</sup>;魏鹏举认为,中国文化产业的日益发展伴随着对金融资本的迫切需求<sup>[39]</sup>,但潘玉香等的研究表明,由于受到融资约束和非效率投资问题的影响,文化创意企业的投资不足,会制约了文化产业的发展<sup>[40]</sup>。因此,具有良好的投融资条件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第二,营商环境影响产业集聚。现有研究指出,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延长企业家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时间、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改善市场公平竞争关系,从而强化外部经济并削弱外部不经济,吸引产业集聚<sup>[41-45]</sup>。SCOTT et al.、TAO et al.、陈建军等的研究表明,产业集聚的形成和传播能够提高文化多样性、提升文化企业生产率,并通过正外部性产生文化产业的集聚规模效应<sup>[46-48]</sup>,带动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对于文化因素的研究中,现阶段专门针对文化产业发展程度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大多局限于规范分析;同时,在量化研究方面,赋予文化因素以经济性,研究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文章虽然存在,

但大都因为数据收集不全、背景与当前经济形势不相匹配、构建的指标不完善等原因存在不足;另外,大多数文献缺乏对于文化产业发展影响经济增长渠道的探讨。而关于营商环境,现有研究成果中关于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较为丰富,并针对营商环境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进行了深入探讨。众多研究表明,营商环境的优化能够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促进经济效率提高,带动当地产业发展,但是已有研究的作用机制大多局限于投资和企业创新领域,较少涉及营商环境在文化产业领域中的作用,存在一定的缺陷。在文化产业发展和营商环境的关系方面,现有文献较少进行直接探讨,也尚未有文献将营商环境作为文化产业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形成完整的逻辑链条梳理这一路径。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将文化产业发展程度这一抽象指标量化,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在省际层面研究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探究这种关系之间的地区异质性,同时强调营商环境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程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机制效应作用,为文化因素的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提供有益的补充,提出文化产业促进经济增长的合理路径。

## 二、理论基础、模型构建及变量说明

### (一) 理论基础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制度经济学盛行,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改变了以往经济研究的框架,强调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重

要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整合到经济学中,诺斯认为如果制度框架给了组织侵权行为最高的报酬,这些幸存的组织能够学习更好的掠夺方式,将这样的组织侵权行为替换为生产力提高,就会带来经济增长<sup>[49]</sup>;也就是说,良好的经济制度能够产生高效运行的市场<sup>[50]</sup>,提高市场运行效率有助于经济增长。讨论具体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若一国的制度设计如果与该国当前国情相适应,则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反之,则可能阻碍经济发展。而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研究表明,一国的历史文化会对制度设计产生影响,而文化同样也是一种非正式制度,这表明文化可能是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本文将中国不同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程度纳入经济增长的研究框架,并着重考察营商环境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本文构建的基本模型如下

$$\ln Y = \ln A + \alpha cul + \beta mar + \gamma cul\_mar \quad (1)$$

式中: $\ln Y$ 为总产出的对数值, $cul$ 为文化产业发展程度, $mar$ 为营商环境, $cul\_mar$ 为文化产业发展程度和营商环境的交互项, $\ln A$ 为常数项, $\alpha$ 为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beta$ 为营商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gamma$ 为营商环境作为文化产业和经济增长间机制效应的强度。

通过式(1)可以看出,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提高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程度和改善营商环境能够增加一个经济体的产出,而营商环境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较高程度,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作用方向以及显著性取决于。具体构建的模型将在下文

中进一步说明。

## (二) 计量经济学模型设计

根据前文中的引言和文献综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文化产业发展程度会对经济发展水平产生直接影响,而区域的营商环境对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着影响。为了验证不同区域的文化产业发展程度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探究地区营商环境对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影响以及文化产业发展程度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是否存在营商环境的机制效应,本文选取中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同时包含截面和时间两个维度。根据上述理论分析,设定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如下

$$\ln gro_{it} = \beta_0 + \beta_1 cul_{it} + \beta_2 mar_{it} + \beta_3 cul\_mar_{it} + \beta_c C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式中: $\ln gro_{it}$ 表示  $t$  年  $i$  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 $cul_{it}$ 为  $t$  年  $i$  省份的文化产业发展程度, $mar_{it}$ 表示  $t$  年  $i$  省份的营商环境, $cul\_mar_{it}$ 为  $t$  年  $i$  省份文化产业发展程度与营商环境的交互项, $C_{it}$ 表示各类控制变量,包括政府干预、基础设施、城镇化率、地区创新能力、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 6 个变量,具体计算方式将在下文中介绍, $\beta_0$ 为待估计截距项, $\beta_1$ 、 $\beta_2$ 、 $\beta_3$ 和  $\beta_c$ 为待估计系数项, $\varepsilon_{it}$ 为随机误差项。

对本文研究目的的判断方法如下: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若显著为正,则文化产业发展程度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类似的,若显著为正,则地区的营商环境也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若都显著为正,说明存在机制效应,也即在良好的营商环境下,文化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更加显著。

### (三)数据来源和变量设定

#### 1.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 2001—2020 年中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以下简称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sup>①</sup>,最终获得 620 个有效观测值。其中,GDP 和各省份的年末总人口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来自各地区统计年鉴;市场化指数来自樊钢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sup>[51]</sup>;各省份的产业结构、城镇化率、人均道路面积、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人数以及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所需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各地区统计年鉴,并加以处理;各省份的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指标来自《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

#### 2. 变量选取

(1)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本文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采用的是地区生产总值指标。为了消除通货膨胀和地区人口数对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本文以 2001 年为基年,除以各省份每年的年末人口数,计算出 2001—2020 年中国 31 个省份的人均实际 GDP。由于人均实际 GDP 的数值相对于其他变量较大,因此将其取自然对数处理,作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

(2)文化产业发展程度。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程度。已有文献采用各省份每人全年平均文化娱乐用品和服务支出来描述文化产业发展程度,考虑到教育行业同样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区的教育水平对于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着显著影响,因此本文采用各省份每人全年平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来衡量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程度,具体的做法是查找地区统计年鉴得到各省份的城镇居民每人全年平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农村居民每人全年平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以及城乡人口数,用它们的乘积之和除以地区的年末总人口,计算加权平均数,并取对数值,作为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程度的衡量指标。

(3)营商环境。对于营商环境的衡量,选用王小鲁等编纂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各省份的市场化总得分<sup>[52-53]</sup>。市场化总得分是与市场相关的 5 个二级指标的综合指标,能够较为合理、全面地反映地区的营商环境。

(4)控制变量。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较为复杂,且其中的很多因素也会影响到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程度。为了尽量减少内生性的影响,本文根据现有研究选取了若干控制变量,包括产业结构、城镇化率、地区创新能力、基础设施、政府干预和人力资本。甘春晖等、于斌斌指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进程会影响经济增长<sup>[54-55]</sup>,陈梦根等的研究表明,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高于其他产业<sup>[56]</sup>;王国刚的研究发现,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心<sup>[57]</sup>,朱孔来等的研究指出,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sup>[58]</sup>,曹裕等、蔺雪琴等的研究分别

① 2020 年之后,由于全球疫情爆发,文化产业发展、营商环境、经济增长以及其他经济指标受到明显冲击,数据出现异常波动,因此本文未包含 2020 年之后的数据。



发现,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能够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物质和人力资本集聚等方式促进经济增长<sup>[59-60]</sup>;创新同样是影响经济的重要因素,张来武指出,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sup>[61]</sup>,刘思明等从多种角度计算创新指数,发现创新指数的提高会给一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带来正向影响<sup>[62]</sup>;廖茂林等、刘生龙等发现,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sup>[63-64]</sup>,张学良发现这一促进作用体现出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sup>[65]</sup>;在政府干预方面,张璟等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干预会通过影响金融机构的资金运用方式影响经济<sup>[66]</sup>,刘文革等的研究指出,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是政府干预影响经济的重要途径<sup>[67]</sup>;杜伟等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能够通过技术模仿、技术创新等方式影响经济增长<sup>[68]</sup>,刘智勇等指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比人力资本存量更能够解释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sup>[69]</sup>。控制变量的具体衡量方式如下,产业结构通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表示;城镇化率运用年末城镇人口占年末总人口的比例来度量;创新能力使用《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中的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指标(包括知识创造、知识获取、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及创新绩效5个维度)来表示;基础设施通过人均道路面积来衡量;政府干预的衡量指标为地区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而人力资本则使用各地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占年末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以上涉及货币衡量的指标均经过了通货膨胀调整,以2001年的不变价计算。

3. 变量总表

本文使用到的变量名称及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

表 1 变量名称及计算方法

代理变量名	变量名称	计算方法
ln gro	经济发展水平	以各省份 2001 年的价格水平为基期,利用 GDP 平均指数,折算出人均实际 GDP,并将其取自然对数
ln cul	文化产业发展程度	各省份的城镇居民每人全年平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和城镇人口数、农村居民每人全年平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和农村人口数,用它们的乘积之和除以地区的年末总人口,计算加权平均数,并将其取自然对数
mar	营商环境	各省份市场化总指数
cul_mar	文化产业发展程度与营商环境的交互项	各省份的每人全年平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与市场化总指数的乘积
ind	产业结构	各省份的第三产业增加值除以地区生产总值
urban	城镇化率	各省份的年末城镇人口与年末总人口的比值
ca	创新能力	各省份的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指标
infra	基础设施	各省份的道路面积除以年末总人口
gov	政府干预	各省份的地区财政中一般预算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
human	人力资本	各省份的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与年末总人口的比值

三、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实证分析中运用到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在对人均 GDP 取对数之后,数据的波动范围缩小,均值为 9.866,标准差为 0.696;地区的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对数值的均值为6.865,而标准差为0.748,极差为3.948,可见在取对数之后,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的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容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 gro	620	9.866	0.696	7.957	11.530
ln cul	620	6.865	0.748	4.664	8.612
mar	620	6.940	2.233	-0.161	11.930
ind	620	0.439	0.092	0.242	0.774
urban	620	0.517	0.155	0.196	0.896
ca	620	28.538	10.818	10.500	62.140
infra	620	4.262	2.319	0.485	12.620
gov	620	0.249	0.185	0.077	1.354
human	620	0.016	0.007	0.003	0.041

不同年份间的文化产业发展程度仍存在明显差异;市场化总得分的最小值为-0.161,而最大值为11.930,这反映了营商环境随地区和时间不同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在控制变量中,由于大部分控制变量采用比重衡量,因此变量的波动范围相对较小;可以看到的是,创新能力综合指数的标准差在所有的控制变量中是最大的,这反映了不同地区间的创新能力存在明显差异,由于各地区的创新资源不同,主导产业的类型也有所不同,因此这样的结果是合理的。

(二) Hausman 检验

本文采用 Hausman 检验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中进行选择,检验的原假设为接受随机效应模型。运用 Hausman 检验,计算出的 chi2 的数值为 90.02, *p* 值为 0.000,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因此拒绝原假设,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三) 基准回归结果

首先对包含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根据基准回归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在两个模型回归结果中,文化产业

表 3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1)	(2)
变量名	ln gro	ln gro
ln cul	0.244 *** (10.490)	0.066 *** (3.070)
ind		-1.223 *** (-9.460)
urban		0.764 *** (5.350)
ca		0.007 *** (7.370)
infra		-0.007 ** (-2.130)
gov		0.098 * (1.840)
human		14.310 *** (9.180)
Constant	7.509 *** (54.530)	8.483 *** (67.290)
Observations	620	620
R-squared	0.979	0.988
Number of prov	31	31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差;\*\*\*、\*\*和\*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发展程度这一核心解释变量前的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文化产业发展程度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前人的研究及本文的预期相符。由于本文采取的是 level-level 模型,因此可将表 3(1)中的系数解释为: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每增加 1%,地区的人均 GDP 增加 0.224%;表 3(2)中的系数解释为: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每增加 1%,地区的人均 GDP 增加 0.066%。表 3(1)中系数大于表 3(2)中系数的主要原因是,表 3(1)中未加入控制变量,存在较大的遗漏变量偏误,因此高估了文化产业发展程度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第二,城镇化率的提高、创新能力的增强、政府干预程度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增加会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在地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农村人口不断进入城市,为城市发展输入了大量劳动力,同时增加了农村居民的收入。一般来说,城镇化率越高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越高,因此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能力的提高响应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号召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更持续的动能,能够有效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的提高;政府一般预算财政支出的增加有利于各项公共设施的建设和完善,有利于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有助于建设高效的服务型政府,为地区经济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人才是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人力资本的提高反映了地区人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为区域发展提供高质量人才,为经济发展注入新鲜活力。

第三,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人均道路面积和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前者可能是由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业,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相比增加值较低,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发达的地区可能忽视了第二产业的发展,导致第二产业较为落后,从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后者可能是因为人均道路面积将乡间小路、废弃公路等包含在内,实际上这些道路的存在并不能够使交通更加便捷,或者这些道路并未实际投入使用,甚至可能占用了可以有更好用途的土地面积,反而阻碍了地区的经济发展。

(四) 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

1. 稳健性检验

(1)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基准回归从需求端切入衡量文化产业发展程度。为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将文化产业发展程度的衡量指标转变为供给端。顾海峰等指出,学术界普遍将文化、文物产业年增加值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衡量指标<sup>[70]</sup>,因此本文使用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的对数值来衡量文化产业发展。这部分数据来自《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但受到官方统计层面的限制,稳健性回归的样本中只包含了2004、2008 及 2015—2020 年的数据。回归的结果如表 4(2) 所示,可以看出,与基准回归相比,采用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衡量文化产业发展并未使结果发生明显变化,可以认为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表 4 稳健性检验

类别	(1)	(2)	(3)	(4)
	缩尾处理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替换控制变量	改变时间区间
变量名	ln gro	ln gro	ln gro	ln gro
ln cul	—	0.066 *** (3.240)	0.046 *** (3.120)	0.096 *** (3.890)
ln cav	0.048 *** (2.720)	—	—	—
human1	—	206.353 *** (11.850)	—	—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9.041 *** (63.570)	8.479 *** (70.890)	9.602 *** (79.300)	8.587 *** (65.520)
Observations	248	620	341	620
R-squared	0.990	0.989	0.989	0.985
Number of prov	31	31	31	31

(2) 替换控制变量。在张元阳的研究中,使用普通高校教职工人数占年末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地区的文化资本。因此本

文将控制变量中人力资本的衡量指标进行相应替换,回归的结果如表4(3)所示。我们发现这一变量的系数与基准回归中的前的系数类似,均有很强的正向显著性,证明了将这一变量纳入回归的正确性。同时,核心解释变量前的系数的大小及显著性与表3(2)相比均未发生明显变化,因此结果通过了替换控制变量衡量方式的稳健性检验。

(3)改变时间区间。根据已有研究,本文推测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的全球新冠疫情会对本文纳入考察的指标特别是经济指标产生冲击。为排除两大全球性重大事件对本文结论的影响,本文缩短样本时间区间到2009—2019年进行回归,以验证原模型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改变时间区间的回归结果如表4(4)所示。观察表4(4)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文化产业发展程度前的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可以认为表4(4)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4)缩尾处理。为消除离群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变量在5%和95%分位上进行缩尾处理。可以看出,与基准回归相比,核心解释变量前面的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未发生明显变化,说明前文研究结果并不是由于离群值所导致的,具有普遍意义,证明了前文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 2. 内生性检验

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遗漏变量问题,尽管本文选择了一系列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但是仍然存在许多会对经济增长

产生影响的变量没有被包含到模型当中,特别是不可观测变量,并且这些变量可能与核心解释变量——文化产业发展程度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二是反向因果问题,文化产业的发展能够带动地区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但是地区经济增长同样会促进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针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通过对核心解释变量文化产业发展程度选取工具变量加以检验。

参照现有研究中的普遍做法,将滞后一期的文化产业发展程度作为当期文化产业发展程度的工具变量。前一年的文化产业发展程度会对后一年的文化产业发展程度产生影响,故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同时,前一年的文化产业发展程度相对于回归模型中的各个当期变量是外生的,不会受到模型中当期变量的影响,因此满足了工具变量的排他性要求。

本文内生性检验步骤如下:

第一,假设  $cul_{it}$  是内生变量。

第二,使用工具变量  $cul_{i,t-1}$  来预测  $cul_{it}$ , 建立的模型为

$$cul_{it} = \delta_0 + \delta_1 cul_{i,t-1} + u_{it} \quad (3)$$

式中:  $cul_{it}$  为  $t$  年  $i$  省份的文化产业发展程度,  $cul_{i,t-1}$  为  $t-1$  年  $i$  省份的文化产业发展程度,  $\delta_0$  为截距项,  $\delta_1$  为  $t-1$  年文化产业发展程度对  $t$  年文化产业发展程度的解释程度,  $u_{it}$  为残差项。

第三,提取上述模型中的残差项  $u_{it}$ , 并将其纳入前文的模型进行回归

$$\ln gro_{it} = \alpha_0 + \alpha_1 cul_{it} + \alpha_2 u_{it} + \alpha_c C_{it} + \varepsilon_{it} \quad (4)$$

式中: $\alpha_0$  为截距项, $\alpha_1$  为  $t$  年文化产业发展对  $t$  年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alpha_2$  为残差项对  $t$  年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alpha_c$  为  $t$  年各个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varepsilon_{it}$  为随机扰动项。

第四,若  $\alpha_2=0$ ,则不存在内生性问题<sup>[71]</sup>。

内生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内生性检验

变量名	(1)	(2)
	ln cul_1	ln gro
ln cul	0.778 *** (33.120)	0.052 ** (2.520)
<i>u</i>		-0.033 (-1.060)
Control	YES	YES
Constant	1.147 *** (7.990)	8.616 *** (68.260)
Observations	589	589
R-squared	0.983	0.969
Number of prov	31	31

观察回归结果可知,表 5(1)中  $u$  前的系数较小,且不具有显著性,说明残差项与被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基本满足上述检验标准。同时,核心解释变量文化产业发展程度仍然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本文采用的模型不具有严重的内生性,能够得出较为正确的结论。

四、机制检验

在发现文化产业发展程度可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前提下,本文进一步分析文化产业发展程度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

市场化总得分能够较好地反映地区营商

环境的发展程度,一个地区的营商环境既有可能直接影响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又有可能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机制变量,来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基础回归的基础上,在变量中加入作为营商环境代理变量的市场化总得分以及市场化总得分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项,来研究营商环境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影响,并考察文化产业发展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营商环境上的异质性。表 6 显示了机制检验的回归结果。

表 6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名	(1)	(2)
	ln gro	ln gro
ln cul	0.264 *** (11.290)	0.090 *** (4.070)
<i>mar</i>	0.123 *** (5.850)	0.071 *** (4.130)
<i>cul_mar</i>	-0.013 *** (-4.710)	-0.009 *** (-3.840)
Control	NO	YES
Constant	7.192 *** (50.140)	8.282 *** (61.760)
Observations	620	620
R-squared	0.980	0.989
Number of prov	31	31

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文化产业发展和市场化总得分前的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后者表明营商环境能够直接影响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而结果显示,文化产业发展程度和营商环境的交互项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营商环境的优化并未给文化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带来积极影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资源有限性和稀缺性,二者之间可能无法按照预期协调配合发展,并且存在认识和执行上

的脱节问题。在文化产业方面,各个地区分配到的资源不均衡,对于有意愿发展文化产业的地区,可能由于资源不足而无法实现,而对于某些当前发展重心不在文化产业的地区,可能由于资源分配过多而造成资源浪费,加之不同地区对于文化产业发展的认知程度和重视程度不同,政策执行力度和受到监督的力度也存在较大差异。而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从大城市到县城再下沉到乡镇,由于县城及乡镇发展本身就缺乏民间资本的投入,资本市场并不活跃,但是依靠财政拨款等方式仍然能够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因此对于营商环境优化的重要性缺乏认识。而受到资源有限性稀缺性的影响和业绩要求,地方可能将财政扶持投入到更容易产生明显可观察到经济效益的领域,而选择性忽略营商环境这一类不直接在经济发展指标上体现出来的变量,并且文化产业和营商环境之间可能存在资源抢占和权衡取舍问题。这导致了我国部分地区文化产业部门无法实现良性发展,营商环境长期得不到改善,无法更好地发挥二者对经济的协同影响。

## 五、异质性分析

由于各省份所在地理位置不同、各种制度等的完善程度不同、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推测,文化产业发展程度和营商环境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以及营商环境的机制效应作用可能存在地区上的异质性,因此通过分地区的异质性分析来验证猜想。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解释,我们将省份划

分为东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其余归入东中部地区。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地区间的异质性检验

变量名	(1)	(2)	(3)	(4)
	东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ln gro$	$\ln gro$	$\ln gro$	$\ln gro$
$\ln cul$	0.166 *** (5.630)	-0.047 (-1.620)	0.268 *** (7.830)	-0.030 (-1.030)
$mar$	—	—	0.153 *** (5.880)	0.026 (0.930)
$\ln cul\_mar$	—	—	-0.019 *** (-5.540)	-0.001 (-0.270)
<i>Control</i>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8.301 *** (51.690)	8.757 *** (44.640)	7.561 *** (38.060)	8.733 *** (44.390)
Observations	420	200	420	200
R-squared	0.989	0.995	0.990	0.995
Number of prov	21	10	21	10

对划分的组别分别进行回归,观察回归系数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文化产业发展程度前面的系数大小和显著性在两组回归结果中存在明显差异,文化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在东中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这与全样本回归的结果类似。但在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表现为不显著的负效应,这可能是因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东中部地区相比较为落后,农业、工业等产业的生产要素投入有限且尚未发展到较高水平。受到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限制和资源有限的约束,西部地区尚未形成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路径,现有追求文化产业发展而实施的举措占用了传统产业的资源,挤压了传统产业的发展空间,从而对当地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

而观察机制变量营商环境及其与文化产业发展程度的交互项,前面的系数大小和显著性在东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中存在明显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考虑了城市地理区位的异质性后,东中部地区的回归结果与全样本回归基本一致;但在西部地区,营商环境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同时营商环境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程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机制效应作用也不显著。这表明营商环境对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效应及其机制效应主要存在于东中部地区。可能原因在于东中部地区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现有产业及配套资源已保持在稳定且较高水平,文化产业和营商环境作为新兴动力,正值较为迅速发展阶段,能够有效与当地现有资源形成配合,促进经济增长的边际收益较高。对于西部地区来说,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影响社会经济增长的各个因素与其他地区相比相对落后,因此仅有文化产业的发展和营商环境的优化并不足以撬动其社会经济增长,只有当各项因素配合增长时,才有可能达到应有的效果。综上,营商环境对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影响、良好的营商环境强化文化产业发展程度,进而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机制效应存在地区间的异质性。

## 六、结论及政策启示

### (一)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文化产业发展程度对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选取的文化产业发展程度的衡量指

标为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地区居民知识水平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促进当地的人力资本积累;文化和娱乐方面的支出增加能够反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以及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同时能够体现居民对于更高质量、多元化的精神生活的追求,这一类别的需求增大能够催生更多创新性的文化娱乐产品。对于机制效应的研究表明,营商环境在沟通文化产业和经济增长之间起着重要作用,当前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 and 营商环境尚未形成良好配合。同时,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文化产业发展程度和营商环境对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影响以及营商环境在文化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机制效应作用均存在地区间的异质性,东中部地区文化产业和营商环境的直接作用及营商环境的机制效应明显强于西部地区,这启示我们要根据地区特点制定不同政策。

### (二) 存在的不足

本文利用中国 2001—2020 年 3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得到了上述结论,但由于数据收集、变量度量等方面的限制,本文构建的模型仍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样本选择。由于地级市层面的部分数据无法获得,本文以中国的省份为研究样本,即将各省份作为一个整体,认为各省份内部的文化产业发展程度、营商环境、经济增长水平及其他社会经济变量是相同的。但事实上,基于省级的样本数据较为有限,各省份内部不同地级市之间的发展水平也可能存在明显差异,本文基于省级数据得出的结论忽

略了同省份不同地级市之间的差异,在地级市层面不一定适用。

第二,时间区间。本文使用的数据时间区间为2001—2020年,这一时间区间内包含有全球范围内的重大事件,这些外生冲击对于中国经济产生影响,但并未被纳入本文的研究,可能导致本文对于文化产业发展的经济效应的估计不准确。同时,尽管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将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新冠疫情进行了剔除,但在这一时间区间内,中国采取了众多不同类别的政策、战略和措施等来带动经济增长,如智慧城市、宽带中国等,本文的研究并无法完全排除其他政策效应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三,模型设计。本文的模型采用的是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到了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但是,经济增长与文化产业发展程度之间的关系可能并非线性,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次幂可能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更强,并且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文化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本文由于相关理论方面的缺乏,并未就上述方面进行讨论。

### (三) 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具有下列政策启示:

第一,应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提高文化产业转化为文化资本的效率。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文化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目前由于中国文化产业并未发展到较为理想的阶段,还存在资源配置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协调、与其他产业融合不充分等问题,影响了文化因素转化为文化资本的

效率,因此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未充分展现。在未来的发展中,政府应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资,优化资源配置,注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多渠道拓宽文化传播途径。同时,采取激励机制,引导资本流向文化领域,让文化产业发展真正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良性因素。

第二,优化文化产业的营商环境建设,促进地区文化产业和营商环境的融合与协同发展。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文化产业发展和营商环境优化能够分别带动经济增长,但是文化产业发展和营商环境之间尚未形成良好配合,部分地区可能存在脱节情况。因此,在关注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和营商环境优化时,不应将它们作为两个独立的角度来研究,而是应该将二者结合起来,使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与营商环境相适应,当二者存在明显的不匹配情况时,应将发展重点倾斜到处于弱势的一方上。同时,要将发展文化产业和优化营商环境的措施真正落实,建立文化产业和营商环境的科学评价体系,定期监督政策措施实施效果,加强市场监管,加快建设现代化市场体系,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和营商环境融合发展、协同共进,让文化产业和营商环境为经济增长释放更多的潜力。

第三,进一步完善激励政策,激发文化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当前,中国的营商环境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一点是市场主体活力不足,导致一些地区的营商环境得不到根本性突破。未来的政策制定应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入手,不断完善市场体系建设,优化监管机



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和交易成本,减小交易风险,对符合要求的文化企业提供政策和资金倾斜,改善融资环境,吸引文化类中小微企业进入市场,鼓励文化类大企业进一步发展,为各类市场相关活动创造更大的空间,从而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经营效率,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转型。

第四,合理配置文化资源,注重区域之间文化发展的协调性。前文的研究表明,文化产业发展程度和营商环境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存在地区上的异质性,因此在东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政策的倾斜重点应有所差异:在所有地区都需要进一步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与此同时,东中部地区在重视文化产业发展和营商环境优化的同时,应更加关注文化产业与营商环境的配合,充分发挥已有优势,不断激发社会经济的发展动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而西部地区在形成自身基础产业的同时,应更加重视配套社会基础设施条件的建设完善及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解决市场准入门槛高、市场监管不当等一系列问题,缩小区域间的差距,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 七、结语

本文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进行研究,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对于中国未来文化产业的发展及探索经济增长的新渠道具有重要启示。本文仅采用省级层面的数据进行研究,在模型构建过程中无法剔除所有的外生冲

击,且模型设计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后续研究会采用更加细化的如地级市层面的数据,尽可能减少外生冲击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并且将模型设计得更加严谨,从而将研究进一步完善。

## 参考文献:

- [1] GREIF A. “Book-review” the medieval village economy: a study of the pareto mapping in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4(4): 1925-1927.
- [2] GRAHAM B, GREG A, JOHN T. A geography of heritage [M]. London: Routledge, 2016.
- [3] SACCO P L, SEGRE G. Creativity, cultural investment and local development: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endogenous growth [M]. Growth and innovation of competitive regions: the rol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nections.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09.
- [4] BOURDIEU P.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M]. London: Routledge, 1984.
- [5] RICHARDSON J G.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M].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6.
- [6] THROSBY D. Cultural capital [J].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1999(23): 3-12.
- [7] 高波, 张志鹏. 文化资本: 经济增长源泉的一种解释 [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4(5): 102-112.
- [8] 李怀亮, 王锦慧. 文化产业发展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J]. 河北学刊, 2011(6): 177-180.
- [9] PEREIRA V B. Experiencing unemployment:

- the role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apital in mediating economic crisis[J]. *Poetics*, 2011 (39): 469-490.
- [10] SCOTT A J. The cultural economy of citi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97, (2): 323-339.
- [11] PRATT A C.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production system: a case study of employment change in Britain, 1984—1991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997 (11): 1953-1974.
- [12] LAWRENCE T B, PHILLIPS N. Understanding cultural industrie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 2002 (4): 430-441.
- [13] 王超越, 吕拉昌. 文化产业数字化驱动与创新路径: 以《黑神话: 悟空》为例[EB/OL]. (2024-12-24) [2025-01-17]. <http://hfgga60-aabc7d15084b00hvw00bubxb0u6bko.fhaz.libproxy.ruc.edu.cn/kcms/detail/13.1356.F.20241224.1427.002.html>.
- [14] 徐鹏程. 文化产业与金融供给侧改革[J]. *管理世界*, 2016(8): 16-22.
- [15] YIN E, PHILLIPS N. Understanding value creation in cultural industries: strategies for creating and managing meaning[J].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applied social sciences*, 2020 (3): 165-180.
- [16] 姜琪. 政府质量、文化资本与地区经济发展——基于数量和质量双重视角的考察[J]. *经济评论*, 2016(2): 58-73.
- [17] 潘越, 梁伟娟, 宁博, 等. 承古启新: 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保护与文化产业发展[J]. *财贸经济*, 2024(10): 82-97.
- [18] BUCCI A, SEGRE G. Culture and human capital in a two-sector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J]. *Research in economics*, 2010 (4): 279-293.
- [19] SACCO P L, FERILLI G, TAVANO B G. From Culture 1.0 to Culture 3.0: three socio-technical regime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value creation through culture, and their impact on european cohesion policies[J]. *Sustainability*, 2018 (11): 3923.
- [20] 张元阳. 金融发展、文化资本与经济增长[J]. *区域金融研究*, 2020(7): 34-39.
- [21] 管振, 孙志军. 教育对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24(6): 79-89.
- [22] 张同功, 张隆, 赵得志, 等. 公共教育支出、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 区域差异视角[J]. *宏观经济研究*, 2020(3): 132-144, 175.
- [23] 董志强, 魏下海, 汤灿晴. 制度软环境与经济发展——基于 30 个大城市营商环境的经验研究[J]. *管理世界*, 2012(4): 9-20.
- [24] MESSAOUD B, TEHENI Z E G. Business regula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what can be explained? [J]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management review*, 2014(2): 69-78.
- [25] GŁODOWSKA A, PERA B.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integration,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real convergence: the experience of the CEE countries [J]. *Economies*, 2019 (2): 54.
- [26] 吴韶华, 胡振华. 营商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J]. *新经济*, 2022(9): 86-91.
- [27] SCHUMPETER J 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 [28] AGHION P, HOWITT P. 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J]. *Econometri-*

- ca, Econometric Society, 1992(2):323-351.
- [29] 夏后学,谭清美,白俊红. 营商环境、企业寻租与市场创新——来自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调查的经验证据[J]. 经济研究, 2019(4): 84-98.
- [30] 许志端,阮舟一龙. 营商环境、技术创新和企业绩效——基于我国省级层面的经验证据[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5):123-134.
- [31] 杜运周,刘秋辰,陈凯薇,等. 营商环境生态、全要素生产率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多元模式——基于复杂系统观的组态分析[J]. 管理世界, 2022(9):127-145.
- [32] 牛志伟,许晨曦,武瑛. 营商环境优化、人力资本效应与企业劳动生产率[J]. 管理世界, 2023(2):83-100.
- [33] 张三保,康璧成,张志学. 中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与量化分析[J]. 经济管理, 2020(4):5-19.
- [34] 张爱华,沈科宇,王钰佼. 基于熵权-WASPAS方法的营商环境统计测度——以中部六省为例[J]. 统计与决策, 2024(23):71-75.
- [35] NCUBE M, SOONAWALLA K, HAUSKEN K. The links between business environment,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equity: a study of African countries[J]. Journal of African business, 2021(1):61-84.
- [36] 张蕊,余进韬. 数字金融、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J]. 现代经济探讨, 2021(7):1-9.
- [37] 何地,林木西. 数字经济、营商环境与产业结构升级[J]. 经济体制改革, 2021(5): 99-105.
- [38] 余晓泓. 美国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及启示[J]. 改革与战略, 2008(12):153-155.
- [39] 魏鹏举. 我国文化产业的融资环境与模式分析[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5):45-51.
- [40] 潘玉香,孟晓咪,赵梦琳. 文化创意企业融资约束对投资效率影响的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16(8):127-136.
- [41] 张国勇,娄成武. 基于制度嵌入性的营商环境优化研究——以辽宁省为例[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3):277-283.
- [42] 魏下海,董志强,张永璟. 营商制度环境为何如此重要? ——来自民营企业“内治外攘”的经验证据[J]. 经济科学, 2015(2): 105-116.
- [43] 何凌云,陶东杰. 营商环境会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吗? ——基于世界银行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8(3): 50-57.
- [45] 牛志伟,许晨曦,武瑛. 营商环境优化、人力资本效应与企业劳动生产率[J]. 管理世界, 2023(2):83-100.
- [46] SCOTT A J. Cultural-products industries and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spects for growth and market contestation in global context [J]. Urban affairs review, 2004(4): 461-490.
- [47] TAO J, HO C Y, Luo S, et al.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creative industries[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19(77):141-154.
- [48] 陈建军,葛宝琴. 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效应及影响因素分析[J]. 当代经济管理, 2008, (9):71-75.
- [49] 道格拉斯·诺斯,路平,何玮. 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发展[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2(5):5-10.
- [50] 道格拉斯·诺斯. 经济变迁的过程[J]. 经济

- 学(季刊),2002(3):797-802.
- [51]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 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11 年报告[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 [52] 王小鲁,樊纲,胡李鹏.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53] 王小鲁,胡李鹏,樊纲.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 [54] 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11(5):4-16,31.
- [55] 于斌斌. 产业结构调整与生产率提升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中国城市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2015(12): 83-98.
- [56] 陈梦根,侯园园.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变迁:2000—2019[J]. 经济研究,2024(1): 53-71.
- [57] 王国刚. 城镇化: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心所在[J]. 经济研究,2010(12): 70-81,148.
- [58] 朱孔来,李静静,乐菲菲. 中国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 统计研究, 2011(9):80-87.
- [59] 曹裕,陈晓红,马跃如. 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统计研究,2010(3):29-36.
- [60] 蔺雪芹,王岱,任旺兵,等. 中国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J]. 地理研究,2013 (4):691-700.
- [61] 张来武. 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J]. 中国软科学,2011(12):1-5.
- [62] 刘思明,张世瑾,朱惠东. 国家创新驱动力度及其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4):3-23.
- [63] 廖茂林,许召元,胡翠,等. 基础设施投资是否还能促进经济增长? ——基于 1994 ~ 2016 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 管理世界,2018(5):63-73.
- [64] 刘生龙,胡鞍钢. 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中国区域差距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10(4):14-23.
- [65] 张学良.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吗——兼论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J]. 中国社会科学,2012(3): 60-77,206.
- [66] 张璟,沈坤荣. 地方政府干预、区域金融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基于财政分权背景的实证研究[J]. 南开经济研究,2008 (6):122-141.
- [67] 刘文革,周文召,仲深,等. 金融发展中的政府干预、资本化进程与经济增长质量[J]. 经济学家,2014(3):64-73.
- [68] 杜伟,杨志江,夏国平. 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14 (8):173-183.
- [69] 刘智勇,李海峥,胡永远,等.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兼论东中西部地区差距的形成和缩小[J]. 经济研究,2018 (3):50-63.
- [70] 顾海峰,卞雨晨. 财政支出、金融及 FDI 发展与文化产业增长——城镇化与教育水平的调节作用[J]. 中国软科学,2021(5):26-37.
- [71] HUASMAN J A. Specification tests in econometrics [J]. Econometrica, 1978 (46): 1251-1271.

(责任编辑:杨南熙)